

父亲 记

美国宾
中国妇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父亲记/樊国宾编.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 - 7 - 80203 - 457 - 0

I. 父… II. 樊…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5121 号

父亲记

作 者: 樊国宾 编

策 划: 殷长风

责任编辑: 藏东

装帧设计: 吴晓莉

责任印制: 王卫东

出 版: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 话: (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邮购)

网 址: 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5 × 241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03 - 457 - 0

定 价: 35.00 元

版 权 声 明

《父亲记》一书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由于我社无法与部分权利人取得联系，为尊重作者的著作权，现特别委托北京版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向权利人转付本丛书中部分文字的稿酬。请相关著作权人直接与北京版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取得联系并领取稿酬。联系方式如下：

吴文波、方芳

北京版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海淀区知春路 23 号量子银座 1403 室 邮编：100083

电话：(010) 82357056 (57,58) -230/229

传真：(010) 82357055

目 录

我是父亲的儿子

- 003. 胡适 / 我的父亲
- 010. 周作人 / 父亲的病
- 015. 包天笑 / 我的父亲
- 018. 丰子恺 / 中举人
- 022. 林语堂 / 父亲
- 026. 钱穆 / 先父对余之幼年教诲
- 031. 冯友兰 / 我的父亲
- 039. 汪曾祺 / 我的父亲
- 045. 黄仁宇 / 父亲影响我成为历史学家
- 050. 冯亦代 / 父亲
- 056. 马悦然 / 我的岳父岳母
- 059. 李敖 / 爸爸的故事
- 065. 白先勇 / 回忆父亲白崇禧
- 071. 钱理群 / 哦，你是我的父亲
- 075. 周国平 / 父亲的死
- 077. 林贤治 / 写在风暴之后
- 081. 阿城 / 父亲
- 086. 朱伟 / 有关父亲：《有关品质》序
- 091. 贾平凹 / 祭父
- 099. 陈平原 / 父亲的书房
- 103. 何立伟 / 一点不能忘记的记忆
- 106. 叶兆言 / 纪念
- 122. 止庵 / 最后的日子
- 128. 夏榆 / 我是父亲的儿子

132. 摩 罗 / 父亲
 137. 刘亮程 / 先父
 146. 宁财神 / 父爱如山
 150. 李俊俊 / 怎样爱父亲——《火光》

我是孩子的父亲

157. 徐志摩 / 我的彼得
 161. 胡 适 /《我的儿子》的通信
 165. 傅 雷 / 傅雷家书
 170. 周作人 / 若子的病
 173. 丰子恺 / 作父亲
 176. 汪曾祺 / 多年父子成兄弟
 179. 余光中 / 我的四个假想敌
 184. 李 敦 / 父亲的文凭和女儿的皮鞋
 188. 董 桥 / 父亲加女儿等于回忆
 190. 周国平 / 一个父亲的札记
 196. 北 岛 / 女儿
 199. 贾平凹 / 关于父子
 203. 何立伟 / 父与子
 205. 马 原 / 给儿子打欠条
 209. 莫 言 / 陪考一日
 213. 吴 亮 / 父女记
 216. 顾 工 / 顾城和诗
 222. 刘醒龙 / 与五岁的女人共进晚餐
 225. 洪 峰 / 关于儿子
 228. 叶兆言 / 女儿二题
 233. 摩 罗 / 我想这样做父亲
 235. 苏 童 / 三口之家
 238. 石钟山 / 生命链
 241. 冉云飞 / 与女儿谈常识
 244. 韩仁均 / 儿子韩寒

父与子

253. 鲁 迅 /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261. 父亲的病

目 录 002/003

- 264. 记忆中的父亲 / 周海婴
- 267. 沈从文 / 滕回生堂今昔记：我的养父
- 272. 团聚 / 沈虎维
- 297. 梁漱溟 / 我的父亲
- 300. 《这个世界会好吗》后记 / 梁培宽
- 303. 曹 禺 / 写给女儿的信
- 304. 记我的爸爸曹禺 / 万方
- 316. 叶圣陶 / 做了父亲
- 318. 父亲的希望 / 叶至善
- 321. 关于父亲 / 叶至诚
- 326. 旧式的情感 / 叶兆言
- 328. 艾 青 / 我的父亲
- 335. 我与爸爸不同的路 / 艾轩、艾未未、艾丹



我是父亲的儿子

父亲在全岛旅行视察之后，由于防疫设备不足，乃染上疟疾，卧病甚久。和他同行的仆役同染疟疾，甚至无一人生还。

——胡适

父亲见我在这里翻书，从不责怪，也不问我翻的都是些什么书。

——冯友兰

爸爸来台湾的目的，的确没别人那么雄壮，一切救国救民反共抗俄的大道理，他全都跟不上。他来台湾，只是怕国民党又说他是“汉奸”而已。爸爸的“汉奸恐惧症”，是我们一家来台湾的根本原因：别人都是怕共产党而来台湾，我们却是怕国民党而来台湾，天下令人哭笑不得之事，无过于此了。

——李敖



胡适（1891~1962）

原名洪骍、嗣糜，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胡适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

胡 适

我的父亲

1. 青年期的家难

我的父亲胡传（1841~1895）（字铁花，号钝夫。原名守珊，故一字守三）生于安徽省绩溪县北部的上庄。兄弟五人，我父最长。我家历代都是以经营茶叶贸易为生的，也就是自故乡山区贩茶往上海一带自设的茶叶店中出售。上海那时已是个大商业中心。我的高祖原已在上海黄浦江对岸的川沙设有小店，祖父又在上海设一支店。父亲幼年即甚壮健。当先祖每年春季返乡收茶时，店中商务便由父亲独力管理。

父亲十六岁时便随先祖去川沙，并由先祖延聘塾师，教授诗文。父亲因为十分聪颖，早为其有志为学的伯父（星五公）所赏识。他认为有这样资质的青年子侄，实在不应该在一个小茶叶店里埋没了。所以父亲被家中长辈特地选出，让他专心读书，以便参加科举。

可是这时正值洪杨起事之后，内战的烽火已日益逼近。当洪、杨于1850年在金田村发难之时，父亲才九岁。1853年太平军进占南京，建立“太平天国”，并以南京为“天京”。数年之内，太平军数度进入皖南徽州山区。1860年我绩溪县亦为太平军攻占，一连三载，父亲和邻居亲友均率领家属到高山里去避难，并据险自卫。1862年情势更为险恶，乃又迁往休宁县暂避。

但是休宁亦非乐土。太平军仍不时进入，家人也四处躲藏。1862年年底，局势稍稍好转，全家乃转返绩溪；不意翌年春初和夏

季，太平军又两度进入。就在太平军第二度入侵时，父亲在 1860 年（清咸丰十年）结婚的原配妻子（冯夫人），便不幸死难了。她是那时我家二十余口——多半是妇孺——中唯一的死难者。当时父亲是我家中唯一年轻力壮的成员，帮助那比他大过二十多岁而颇有名望的乡绅伯父，渡此大难。

在 1860 年至 1864 年（清咸丰十年至同治三年）四年之间，皖南真糜烂不堪。对这四年的灾情，父亲在他遗留下来的自述里都有极详尽的记载。事实上他这段记述，远较当时其他任何（类似）的记述更为翔实。

在父亲的回忆录里，他曾做一概括的统计：我上庄村内的胡氏宗祠原完工于 1840 年（道光二十年），亦即洪杨起事前十年，也是太平军犯境前二十年。宗祠毁于 1861 年（咸丰十一年）。太平乱前数百年我乡皆太平无事。地方殷实，人丁兴旺。我族那时曾做过一次丁口总计，以便按口派捐，建造祠堂。当时全族男女老幼约六千人。太平军覆灭后的第二年（1865），我族再做第二次的人口调查，拟再按口派捐，重建宗祠。调查所得，乱后剩余丁口不过一千二百人左右，人口减少了百分之八十。

父亲所做的统计还有其他方面的记录，颇饶历史趣味。在这群大难不死的劫后余生中，竟有二百人染有烟癖！鸦片鬼的堕落，实有甚于一般游手好闲的懒汉。他们终年耕耘所获，还不足以偿付烟债。父亲那时便自问，这种人在生活上何能自给呢？！他的结论则是这整个胡氏一族都仰赖于四百几十个经商在外的父兄子弟的接济。他们的汇款也救活了家人，并助其重建家园于大难之后。

2. 考试和书院教育

太平战后，父亲于同治四年（1865）进学为秀才，时年二十四岁。当年一个人读书上进先要在他祖籍所在通过“县试”，再参加省方所主持的“府试”；府试及格，便进学为“秀才”。即为秀才，则每三年都得应考一次，叫作“岁考”。如果一个秀才希望参加举人考试，他还要通过省级主办的甄别试验，叫作“科考”。科考及格才可参加“省试”（亦称“乡试”）。乡试是朝廷特派的“主考”所主持的（乡试及格，便“中举”成为“举人”了）。

父亲进学之后，参加了几次“省试”都未能如愿。他深深了解他的学业为战火所耽误了，所以他决定到上海去进那些战后重开的

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论；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两年多；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 1920 年至 1933 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 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1946 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 年去美国，后去台湾。1954 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 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 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书院”，继续进修。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乃于 1868 年春初进了新近复校的“龙门书院”。该院山长（院长）刘熙载先生是当时扬州有名的经师。父亲被录取之后，便在该院读了三年——从 1868 年到 1871 年。

在父亲的回忆录里，他记载了当时书院里的生活，特别是一些同学之间的交往与学习的经验。他的同学之中后来有许多都在政治上和学术上有相当成就的。父亲对这位了不起的刘山长的教学方式也有所记载。他说所有在书院中受课的学生，每人每日都得写一份“日程”和一份“日记”。前者记载为学的进度；后者是记学者的心得和疑虑。为这种“日程”和“日记”的记述，该院都有特别印好的格式，按规格来加以记录。这些“日记”和“日程”父亲均保留下来。其中有趣而值得一提的，便是这印刷品的卷端都印有红字的宋儒朱熹和张载等人的语录。其中一份张载的语录便是：“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是个完全中国文明传统之内的书院精神。

我所敬重的老朋友吴稚晖先生，生于 1865 年，比父亲小二十四岁。吴先生也曾经告诉过我一件有关另一“书院”的惊人而有趣的故事。吴先生曾就读于江苏“南菁书院”。当吴氏第一次拜谒该院山长名儒黄以周先生时，他看到黄先生书斋上挂着一大幅使他难忘的格言：“实事求是，莫作调人！”这句格言如译成英语或白话，那就是：“寻找真理，绝不含糊！”这些也都说明了我国 19 世纪一些高等学府里的治学精神。

父亲的自述里几乎以四分之一的篇幅，记述其重建上庄胡氏宗祠的经过。这项重建历时凡十一年，共费制钱一千三百三十万（约合银元一万三千三百元）。自 1865 年动工，直至 1876 年（光绪二年），父亲三十六岁那年才正式完工的。在这项伟大的工程中，他不但是该项工程粗工细活主要的规划者和执行人，他有时还要说服和克制族中守旧分子的反对。他所遗留的记录不幸有一部分毁于火灾，但是这份记录却替后世留下了当年聚族而居的农村里的生活状况、社会组织和社会公益活动的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此期间，父亲曾对中国地理——尤其边疆地理发生了研究的兴趣，这兴趣是他在上海龙门书院当学生时便养成的。他继续对地理学进修的原因，也是受当时国际和远东重要变动的影响。据父亲的记录，他对当时政府和士大夫对世界地理和中国边疆——尤其是

东三省的地理之无知，感到震惊！所以他便下定决心终生致力于中国边疆地理的研究。

3. 吴大的知遇

当父亲于数年之内把家事稍事安顿之后，他便决定撇开家族乡党的小天地而远游北京，另图发展。在 1881 年（光绪七年）他年已四十，乃向一位经商致富的族伯（胡嘉言）借了一百银元，搭船自上海去天津转往北京。在北京他仅凭两封推荐书，旅行了 42 天，到了吴大钦差的驻地宁古塔。吴氏为一自修而成名的大学者、考古学家和政治家。父亲告诉吴公他不是来求职的，他只盼吴氏能给予护照和通行证，好让他遍游东北，并考察边疆地理。吴氏对父亲大为赏识，其后吴氏巡行阅边，总是偕父亲同行；尤其是 1882 年（光绪八年）中俄勘定疆界时，他们曾同晤俄方勘界专员。

就在这一年吴氏正式聘任父亲为其幕僚。稍后吴氏并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专折向朝廷特别保荐，说父亲胡传“有体有用，实足为国家干济之才，不仅备一方牧令之选”。父亲惊喜之余，当然也深感吴公的知遇。其后多年便一直在吴公幕府，参与机要。

父亲在东北一段时期往各地旅行考察，备历艰险。在 1883 年（光绪九年）一次（兼查十三道，牙河地势）途中，一行人员在森林中大雪迷路，三日不得出。干粮已尽，计无可施。此时父亲忽有所悟，他叫随行人员去寻觅一条山涧，然后循山涧而下。因为山涧总归会流出山区的，循山涧找出路，应该是不会错的。于是他们找到了一条山涧，循涧而下，终于脱险。为此，父亲曾作了一首诗，以为纪念。四十年后，当我在 1919 年发表一系列有关实验主义的讲演之时，我还举出这个例子，来诠释约翰·杜威在他《思维术》里所阐明的理论。

自 1881 年以后，父亲便一直致力于公务。自 1881 年至 1886 年，他在东北服务六年。1886 年先祖母逝世，父亲返里奔丧。翌年又转广州依广东巡抚吴大。吴派他去海南岛视察，并报告全岛土著状况，做可能开发的筹划。父亲于此行所保留的详细日记，后来曾发表于专研地理学的《禹贡半月刊》。

1888 年（光绪十四年），黄河在郑州一带决口。吴大自粤奉调任河道总督；设督署于郑州，监督堤工。父亲乃随吴去郑州。在此期间父亲亦记有详尽日记，记录构料、修堤等工作。当年的河工不但

极其腐化，且有各种迷信掺杂其间。迷信之一便是崇奉水蛇、蛤蟆为“河神”。

父亲在治河时期日记里便作了十首《郑工合龙纪事诗》，其中的一首便坦白地批判这迷信之无稽。下面便是这首诗的原文：

纷纷歌舞赛蛇虫，
酒醴牲牢告洁丰。
果有神灵来护佑，
天寒何故不临工？

我引这首诗来说明我父亲生命里富于学术的一面。他是笃信宋儒的，尤其崇奉程颢、程颐和朱熹，是所谓“理学”。由于业师刘熙载先生的教诲，我父亲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也很大，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对大清帝国内当时所流行的宗教，予以严肃的怀疑与批判。

由于襄赞治河的劳绩，吴大乃保举父亲以直隶州候补知州分发各省候缺任用。1889年（光绪十五年）父亲自郑州请假返籍探亲。便在这一次短暂的探亲假期，我父母就在原籍结婚了。婚后父亲乃携眷返郑州继续治河。翌年，父亲乃离开河南任所往北京等候签派新职。当年合格官吏的选派，多凭抽签决定。父亲抽得往江苏省候补的签，这在当时实在是最好的机会了。所以在1890年到1891年两年之间，我父母均住在江苏省会所在地的苏州；后来又被派往上海，担任“松沪厘卡总巡”。我便是1891年12月在上海出世的。就在这一段时期里，父亲已有“能吏”之名，所以其他各省当局，对他也就竞相延揽了。

4. 在台湾任知州和统领

1892年，不但使我父亲原任所在的江苏省署，就是广东省署和新设的台湾省署，都纷纷奏请朝廷想调请父亲前往各该省任职。但是北京中央则循新任台湾巡抚邵友濂之请，调父亲去台湾任职，盖当时台湾省治新设，需要人才甚急，所以北京吏部乃遴选干员胡传，前往台湾，襄赞省政。奉命之后，父亲不得已只好暂留眷属于上海，于1892年只身赴台。其后在台湾一直任职达四年之久。

在台任职期间，父亲曾巡视全岛各地，并代邵巡抚亲往澎湖列岛视察军务。他的巡台日记，以及对邵巡抚的禀启，均曾由今日的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付印出版。

父亲因为深谙地理之学，根据所学加以判断，他认为当时全台各地的防御工事，例如各地的炮台，对台湾的实际防御均无补于事。在（1885年）中法战后，我国南洋海军全毁，台湾门户洞开，全岛实际上无防御之可言。所以他在向省署的稟启中，坦白指陈当时散置全岛各地各种零星防御工事，以及落伍逾龄的各种武器，和那些装备训练均感不足的武装部队，全属浪费。父亲乃稟请省署将这些无用的设施，全部废弃。另行训练一支小型海军，以为全岛防务之用。

父亲在全岛旅行视察之后，由于当时防疫设备不足，乃染上疟疾，卧病甚久。和他同行的仆役亦同染疟疾，甚至无一人生还！

1892年，父亲又受委管理全岛盐政，半年之内便有很多的兴革。最近一位盐务专家便曾根据父亲有关盐政的报告，撰文研讨父亲当年对台湾盐政的贡献。

1893年（光绪十九年）父亲又受（台湾藩台唐景崧）牌委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台东当时是台湾唯一的一个直隶州。他接任只有一天，台东的后山驻军统领——可能因为心脏病猝发——突告病故。邵友濂巡抚乃委派父亲兼领台东后山军务。所以当我在1952年访问台东时，台东父老仍然记得我的父亲是位武官——胡统领，而非文官——胡知州。

在父亲统军期间，他发现全军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官兵吸食鸦片。因为那时台湾疟疾流行，军中官兵误信鸦片可以防疟，所以几乎全军吸毒。父亲最恨吸毒，故极力使全军戒毒。这些事，在他的巡台日记里都有详细的记载。

就在父亲在台湾担任统领这段时间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我军战败。强大的北洋海军全部为敌所毁。当北洋海军于1894年全军覆灭时，我父深知台湾已无法防守。如众所知，1895年中日马关和会时，我国把台湾割让于日本作为赔偿。所有清廷派来台湾的官吏，均奉召返回大陆。

可是台湾居民却强烈反对，尤其是当地士绅，他们群起吁请巡抚唐景崧制止割让，并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选唐景崧为“伯理玺天德”（总统）。这个“民主国”事实上只存在不过数周——甚或只有几天——就完结了，但是台湾的抗日运动却延续至数月之久。

父亲迟至1895年6月25日始离职返回大陆。此时大陆与台湾

电讯已断。土著与土匪又纷起滋事。所幸父亲在台时颇有政声，所以尚能沿途通行无阻，返回台湾临时省会所在地（台南）。这时他已染了严重的脚气病，两腿浮肿，不能行动。但正如上节所提，父亲行政才能曾历经上峰嘉许，所以此时的新军事领袖刘永福将军，仍坚留我父在台继续服务。刘氏是前任巡抚和“伯理玺天德”离台后，全岛唯一的军事领袖，那时尚统治南部半个岛。父亲在台直病到不能行动的情况下，刘氏始允许他离台内渡。父亲于 1895 年 8 月 18 日离台，8 月 22 日病故于厦门——他成为“台湾民主国”的殉难者之一。

下面是父亲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6 月 20 日所立的遗嘱。虽然那时和他共患难的家人，都已离台赴沪，我二哥嗣尚随侍在侧。遗嘱的全文如下：

予生不辰，自弱冠以后，备历艰险，几死者数矣。咸同之间，粤寇蹂躏吾乡，流离播越，五年之久，刀兵、疠疫、饥饿三者交迫，屡濒于危而不死。在婺源覆舟于鹅掌滩下，亦幸不死。光绪癸未正月，在宁古塔奉檄由瑚布图河历老松岭赴珲春与俄罗斯廓米萨尔会勘边界，中途遇大雪，失道误入窝棘中，绝粮三日不死（窝棘者译言老林也）。乙酉，署五常抚民同知，八月廿三日，马贼猝来攻城，城人逃散，予以十三人御之，幸胜而不死。丁亥，在广东奉檄渡海至琼州察看黎峒地势，自琼而南，直穿黎心以达崖州，染瘴病困于陵水，亦不死。壬辰之春，奉旨调台湾差委，至则派查全省营伍，台湾瘴疠与琼州等，予自三月奉檄，遍历台南北、前后山，兼至澎湖，驰驱于炎蒸瘴毒之中，从人死尽，而予独不死。今朝廷已弃台湾，诏臣民内渡，予守后山，地僻而远，闻命独迟，不得早自拔，台民变，后山饷源断，路梗文报不通，又陷于绝地，将死矣！嗟呼，往昔之所历，自以为必死而卒得免于死，今者之所遇，义可以无死，而或不能免于死，要之皆命也。汝从予于此，将来能免与否，亦命也。书此付汝知之，勿为无益之忧惧也。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 年 6 月 20 日）书台东镇海后军中营示驿儿。

铁花

周作人

父亲的病

(上)

我于甲午年往三味书屋读书，但细想起来，又似乎是正月上的学，那么是乙未年了，不过这已经记不清楚了，所还记得的是初上学时的情形。我因为没有书桌，就是有抽屉的书桌，所以从家里叫用人背了一张八仙桌去，很是不像样，所读的书是《中庸》上半本，普通叫做“上中”，第一天所上的“生书”，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哀公问政”这一节，因为里边有“夫政也者蒲芦也”这一句，觉得很是好玩，所以至今不曾忘记。回想起来，我的读书成绩实在是羞得很，那时我已是十二岁，在本家的书房里也混过了好几年，但是所读的书总计起来，才只得《大学》一卷和《中庸》半卷罢了。本来这两种书是著名的难读的，小时候所熟知的儿歌有一首说得好：

大学大学

屁股打得烂落！

中庸中庸，

屁股打得好种葱！

本来大学者“大人之学”，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不是小学生所能懂得的事情；我刚拿出《中庸》来看，那上边的两句即“人道敏政，地道敏树”，还不能晓得这里讲的是什么，觉得那时的



周作人 (1885~1967)

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櫆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鲁迅二弟。

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

 参见 261 页：鲁迅
《父亲的病》